

胡适文集丛编



胡 明 著

胡适传论

(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

胡 明 著

胡适传论

(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



自序……………1

第一章 序篇……………1

- 一 胡适的先世……………1
 - 二 胡适的故乡……………9
 - 三 胡适的父亲……………22
 - 四 胡适的母亲……………41
 - 五 胡适的大家族……………51
 - 六 胡适的小家庭……………62
-

第二章 故乡九年……………86

- 七 从台湾回绩溪……………86
 - 八 私塾与启蒙……………93
 - 九 读小说到讲故事……………102
 - 十 无神论的结胎……………110
 - 十一 风雨如晦中的寡母幼子……………120
 - 十二 出门……………131
-

第三章 上海滩新少年……………137

- 十三 从“梅溪”到“澄衷”……………137
- 十四 时代潮流的溅濡……………146

- 十五 《竞业旬报》——思想之胚芽、文笔之摇篮……………161
- 十六 少年诗人……………188
- 十七 中国公学之风潮……………206
- 十八 考官费留美前后……………215

第四章 青年时代——留美七年……………231

- 十九 踏上异国——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沐浴……………231
- 二十 人文科学的选择到淑世主义的确立……………243
- 二十一 学问之路——贯通中西、融会古今……………259
- 二十二 政治的兴趣与美式政治的训练……………277
- 二十三 胡适思想奠基……………299
- 二十四 博士与事业……………321

第五章 新文化的火炬……………342

- 二十五 文学革命的号角——首举义旗……………342
- 二十六 蔡元培、陈独秀的圈子——北京大学与《新青年》……………364
- 二十七 “我的儿子”与“我的宗教”……………390
- 二十八 《每周评论》与“问题”“主义”……………410
- 二十九 “哲学史”开山和“新思潮”开路……………440
- 三十 “新诗老祖宗”……………459

第六章 中国现代学术的新盟主·····488

- 三十一 新红学的日出·····488
- 三十二 整理国故,捉妖打鬼·····517
- 三十三 科学人生观与“胡适新十诫”·····537
- 三十四 新教育的催生婆和护法神·····557
- 三十五 摆渡西洋近代文明的舵手·····579
- 三十六 一个新孔子·····599

第七章 政治妊娠的胎动与流产·····627

- 三十七 好人政治与好人政府·····627
- 三十八 清廷问题与善后会议·····649
- 三十九 与国共两党的政治冲突·····665
- 四十 西游与东望——苏美两块样板之间·····687
- 四十一 《新月》的光和“人权”的火·····706
- 四十二 落花流水辞江南·····729

第八章 独立的旗帜·····750

- 四十三 《独立评论》·····750
- 四十四 “民治”与“独裁”的讨论·····771
- 四十五 “民权保障同盟”的风波·····794
- 四十六 南游·····809
- 四十七 日本人问题·····828

四十八	“三代遗风”到一二九运动·····	850
-----	-------------------	-----

第九章 “小卒过河”·····868

四十九	从低调抗日到奔赴国难·····	868
五十	驻美大使·····	887
五十一	卸任之后·····	914
五十二	北京大学校长·····	935
五十三	“小卒”沉底·····	960
五十四	仓皇出逃·····	984

第十章 海外的日子·····1005

五十五	纽约寓公·····	1005
五十六	大陆批判胡适思想·····	1025
五十七	台湾围剿胡适幽灵·····	1054
五十八	“中央研究院”院长·····	1075
五十九	雷震事件冲击波·····	1095
六十	巨星陨落·····	1121

第七章 政治妊娠的胎动与流产

三十七 好人政治与好人政府

1922年5月7日胡适主办的《努力》周报(英文名 The Endeavor)创刊,这是胡适“谈政治”的一个刊物,也是胡适回国之后“谈政治”的开端。胡适谈政治、办政论刊物的一个根本出发点是,尽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对国家、民族的休咎盛衰,对政治的清明秽浊不能袖手旁观,不能不闻不问,不能不发出自己的声音。政治的糜烂、政府的腐败已臻极致,胡适一颗医国救世的赤心开始激烈地跳动,时代已经不容许他在政治上再沉默,天下事或许因为我——还有我与你、我与他——的努力还有救。作为创刊献词的《努力歌》里的一段,胡适说:

天下无不可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为好人的——
也都说“不可为”,
那才真是“不可为了”。

天下事的关键在“好人”的“努力”。胡适忍不住唱道：“朋友们，我们唱个《努力歌》：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努力！努力！”——“努力”的下手处在哪里？“你没有下手处吗？从下手处下手！”（《后努力歌》）胡适的“努力”的下手处便是办《努力》周刊，通过政治舆论来努力干预政治，监督与引导政治向清明处运动。^①他呼吁“好人”出来干政治，办政府，一步一步把政治引上轨道。第2号的《努力》周报便登载了由胡适起草，蔡元培、李大钊等十六位名贤具签的政治意见提纲《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个“政治主张”引起社会舆论界的巨大反响，胡适与《努力》周报立刻进入了政治改革讨论的中心位置。从第7号的《努力》开始，胡适独辟“这一周”政治评论栏目，对时政发表直捷的意见：要求、忠告、呼吁、建议、批评、规箴、警告。从《努力》周报开始，经后来的《新月》、《独立评论》直到晚年的《自由中国》，我们不仅可以完整地看到具有强烈责任意识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政治灵魂的心路历程，而且还能惊悚地读到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政治的失败史——以胡适个人为典型代表的政治妊娠胎动至流产的悲剧性演绎。

胡适曾说：“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这个“忍不住的新努力”就是胡适在《我的歧路》中所谓的“歧路”。胡适在关于自己踏上这个“歧路”的自述中说：“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留美七年间，他一面热心为中国的民族革命和民主宪政辩护真挚地奔走号呼，一面高度注意世界政治的演化。他是“世界学生会”的主席，又是“国际政策会”的会员，又是“联校非兵会”的干事，为政治投入过巨大的精力与时间，写过很多文章，出过很大的风头。为了坚

执己见力排众议,他还不止一次当过“众矢之的”。1916年他的一篇“国际非攻”的论文曾获得过美国最高奖金。他的《胡适留学日记》中留下大量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议论、资料、图片、政治领袖演说辞和统计图表。1912年和1916年的美国大选中,他作为一个来自异国采风观国的年轻留学生竟比美国公民还要热衷地投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狂热地沉浸在对美国政治的观察学习、模仿训练中……只是后来迫在眉睫的哲学博士课业和郁然勃兴的文学革命的讨论才稍稍冷却了青年胡适的政治热情。1917回国时,他目睹了中国思想界的落后,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学术界的空白,“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哲学与文学是初回国的四五年里他全力关注的,他写的近百万字的文章,也只是一篇《曾琦〈国体与青年〉序》是谈政治的,其余的全是有关思想文艺的。1919年6月胡适接办《每周评论》,看到国内新舆论界高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于是,他发愤要想谈政治,做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作为开始谈政治的“导论”,“本文”没有来得及炮制出笼,《每周评论》就被封禁了。胡适的政论文章流产的同时,他的谈政治的热心也冷却了下来。

从《每周评论》被北洋政府封禁到胡适踏上“政治歧路”的两年八个月当中,胡适一是忙与病分不出身来谈政治,搞舆论,二是“实在舍不得丢了我的旧恋(哲学、文学)来巴结我的新欢(政治)”,他基本上是在“等”。“然而我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战争’与‘赢余价值’,

内政腐败到了极处，他们好像都不曾看见，他们索性把‘社论’、‘时评’都取消了，拿那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爱罗先珂的附张来做挡箭牌、掩眼法！”这里胡适非常明确地表示了他对新舆论界的蔑视与憎恶，明白表示他现在出来谈政治便是被国内这个“新舆论界”激出来或者说逼出来的。胡适愤激地说：“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

胡适原来一直是等着，盼望着国内有人出来办一份有正面主张又有学理水平的政论报纸。我们注意到胡适《十七年的回顾》（1920年10月作）中对《时报》的厚望：“《时报》是……一个立过大功的先锋，我希望他不必抛弃了先锋的地位，我希望他发愤向前努力替社会开先路。”我们也注意到他的《祝〈白话晚报〉》（1922年3月作）中发自内心深处的一段话：“这个时候，何苦又去添出一种报呢？我以为此时在北京，别无办新报的理由，只有一个理由，就是要出一个有主张的报。”“有主张”，当然主要是政治上有主张，是这个时候北京办报的唯一理由，也是唯一目的。胡适还进一步说：“这个时代的报纸，不但应该有主张，还应该有学理与见解做主张的根据。根据正确的观察，参用相当的学理，加上公开的态度，发为公开的主张，那才是‘禁得起一驳’的主张了。”这实际上已是他正在筹办中的《努力》周刊的办刊宗旨了。显然《时报》与《白话晚报》没有能做到符合胡适的意愿与期望，自己出来办报，宣传自己的主张便责无旁贷了。胡适在1922年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自从《每周评论》

被封禁之后(八年八月底),我等了一年多,希想国内有人出来做这种事业,办一个公开的、正谊的好报。但是我始终失望了。现在政府不准我办报,我更不能不办了。梁任公吃亏在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去做总长。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这段话中,“现在政府不准我办报”系指《努力》的出版申请于三天前(2月4日)遭到政府新闻官署的驳回而说的;梁任公吃亏在于做总长云云,系回答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一班朋友——高梦旦、王云五、张菊生等的劝告。“商务”的朋友们担心胡适要做“梁任公之续”,他们劝胡适:专心著书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

反对胡适办报谈政治、作政论的,不仅有商务印书馆的朋友们,《晨报》副刊的孙伏庐反对最激烈。他写信给胡适说:“我总有一种偏见,以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从大多数没有智识的人,决不能产生什么好政治。从前许多抛了文化专谈政治的人现在都碰了头回过来了,为什么先生一定也要去走一走这条不经济的路子?……我实在为先生的光阴,先生的精神,先生的前途可惜。”在孙伏庐看来,大多数人所以敬仰胡适,“胡适之”三个字之所以可贵,“全在先生的革新方法能在思想方面下手,与从前许多革新家不同。换言之,全在先生能做他人所不能做的中国哲学史,能做他人所不能做的国语文学史,能考证他人所不能考证的《红楼梦》,能提倡他人所不能提倡的白话文。现在先生抛弃这些可宝贵的事业,却来做《政治家与政党》^②一类文章,我知稍有识者必知其不值。”故孙伏庐声称:“我是痴想竭我绵薄,将已被政治史夺了去的先生,替文化史争回来。”把胡适从政治史里争夺回文化史里,或者说防止胡适从文化史里滑下

向政治史里,人似不少,胡适原来的北大学生们都存此想。如傅斯年在1920年8月从国外寄给胡适的一封词情恳切的信中,希望胡适以自己的识与力投到学问事业中去,“为社会上计,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之风气,而不宜止于批评之风气”。

但是热情支持胡适办报谈政治的却也大有人在,首先就是他的挚友丁文江。丁文江痛恨军阀专权与政治黑暗,他积极主张一班朋友组织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批评政治和提倡政治改革的实际准备。他批评胡适“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告诫人们:“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要先从思想文艺下手。”他对胡适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胡适自己当然也感到了“实际的政治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丁文江不仅怂恿胡适政治上“下海”,而且自己在《努力》上也拼命写文章。据他自己统计,《努力》的一年半时间,他共做了一百二十三栏的文章,恰合十万字(见1924年1月13日致胡适信)。除此,胡适的老朋友任叔永、陈衡哲夫妇也积极支持,胡适搞文学革命时的老对手梅光迪也出乎意外地热情支持胡适谈政治、做政论。他在《努力》创办伊始的1922年5月的一封信给胡适的信中称:“《努力》周报所刊政治主张及其言论,多合弟意。兄谈政治,不趋极端,不涉妄想,大可有功社会,较之谈白话文与实验主义胜万万矣。”拾胡适的政治主张,目的似在抑胡适的白话文与实验主义。但他说的“兄谈政治,不趋极端,不涉妄想”两条当是实情。胡适的“主张”都参以相当的学理,正确的观察,公开的态度,这便保证他们是务实的讨论,是负责任的研究。

究问题。不趋极端,不涉妄想,其本身便是一种实验主义的态度。全力支持胡适的还有胡适的朋友常燕生。常燕生不仅明确希望胡适“此时把全副精神用在政治上”,而且指明:“我们现在只能走这政治的一步,过了这一步再走到工艺的一步,只有科学工艺是康庄大道,但你非过了这政治的一关不成。”他断定:谈政治的《努力》的历史功劳必不在谈思想文艺的《新青年》之下。

夹在两种真诚的希望之间的胡适这时已经态度明朗,言论的冲动已经压掩不住,但他的公开回答却还是强调了他的学理。首先,他指出他现在谈政治与以前谈白话文、谈思想文艺一样都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他说:“我这几年的言论文字,只是这一种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方面的应用,我的唯一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我现在谈政治,也希望在政论界提倡这一种‘注重事实,尊崇证验’的方法。”(《我的歧路》)他也为他的实验主义思想方法在政论上的应用做了一个解释:“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他只是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一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这才是真进化。”因此胡适强调,“我不曾变节”,“我的态度是如故的,只有我的材料与实例变了”。

胡适纠正孙伏庐的“政治史夺去,文化史争回”的说法,指出:“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他过去谈思想文艺,现在谈政治都是会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又都是文化史的本分的内容,谈政治本身也是在文化史之内,正不需“夺去”“争回”的。不过他声明,他谈政治的比例是一比七,即七天之中,一天谈政治,编《努力》,“其余六天仍旧去研究我的哲学

与文学”。最后，胡适还宣布他谈政治并不妨碍他继续在思想文艺领域里打鬼捉妖，思想文艺领域的工作犹很繁重犹很迫切。他直说：“我对于现今的思想文艺，是很不满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了一班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隶；陈腐的古典主义打倒了，却换上了种种浅薄的新典主义。”这一点埋在胡适心中的思想情结在他后来谈政治彻底“止了壁”、光荣失败后，立即迅速膨胀，并回归原位，便是胡适在1923年10月作的关于《努力》的总结《一年半的回顾》中的那个结论：“从此以后《努力》的同人渐渐地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去努力了。那个新的方向便是思想的革新。”胡适这里说的“新的”方向其实正就是他在谈政治之前的老方向或原来的方向，何新之有？不过到那时他的“思想的革新”意识更峻深了，更急迫了。

胡适的政治主张——以十六人具签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公开宣言形式表示出来——的核心意见，便是公认以“好政府”为政治改革的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好政府”的概念实际诞生在一年前的1921年6月。6月18日胡适对来访的安徽籍旧国会议员汪建刚说：

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一种时髦东西，这是大错的。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我们应谈有政府主义，应谈好政府主义！

——《胡适的日记》

这里“有政府主义”与“好政府主义”下的黑点是胡适自己加的。1921年10月4日胡适在《双十节的鬼歌》的诗里正式提出“造一个好政府”。这首诗胡适是怀着强烈的政治激情写的，其中

核心的一段云：“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好政府”对“鸟政府”。胡适公开地、系统地、完整地阐述“好政府主义”是他于1921年8月5日在安庆的一次公开讲演的主要内容^③（胡适称：“这是我第一次公开的谈政治”）。这个讲演我们后面再谈。胡适已经明确把“好政府”作为“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公共目标”，“其实行的条件”便是：“一班‘好人’都结合起来，为这个目标作积极的奋斗。”他说：“好人不出头，坏人背了世界走！”“好政府”首先是由“好人”组合的“政府”，胡适这里强调“好人政府不等于好政府。好政府不但要人格上的可靠，还要能力上的可以有为”。（1922年10月27日日记）这里的好人政府与好人政治与梁启超提倡过的“贤人政治”有一点明显区别：梁氏提倡“贤人政治”时是“凭藉一种固有的旧势力”，而胡适这里的好人政治，凭藉的已是一个时代的新人。《我们的政治主张》邀约签名时有意排拒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便是最好的明证，林长民（宗孟）调侃梁氏的一句话说到了点子上：“适之我们不怪他，他是个处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往来。”但是“好人”们也未必全是时代新人，他们也不少是暮气重重的。故梁漱溟——十六位签名的“好人”之一——写信对胡适说：“今日人民太无生气，好人太无生气，故闹到如此地步。吾曹好人须谋所以发挥吾曹之好者，谋所以发挥人民生气者，则今日恶局势乃有转移。否则将长此终古矣。”“吾曹好人”出来发挥“吾曹之好者”，这也正是胡适好人政治——好人政府的根本思路，也是胡适谋求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工夫”。他说：“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好人笼

看手,恶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我们的政治主张》)

《我们的政治主张》是胡适 1922 年 5 月 11 日写出的。那一天他的日记中称:“做一篇《我们的政治主张》。是第一次做政论,很觉得吃力。这本是想专为《努力》做的,后来我想此文颇可用为一个公开的宣言,故半夜脱稿时,打电话与守常商议,定明日在蔡先生家会议,邀几个‘好人’加入。知行首先赞成,并担保王伯秋亦加入。”第二天在蔡元培家开会,文本定名为《我们的政治主张》。结果赞成这个“政治主张”并愿意签名的共十六人: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知行(即陶行知)、王伯秋、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徵、丁文江、胡适。13 日交记者发电至上海,并交通讯社传播,14 日出版的《努力》第 2 号上刊出全文。

《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内容分五个部分。第一“政治改革的目标”,也即是确立“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第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消极方面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积极方面则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第三,“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即要求建立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一个有计划的政府。政府是“宪政的”,即“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公开的”，主要是财政的公开与用人考试的公开；“有计划的”，胡适对这一条十分看重，他以后又反复强调过这一点：“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计划是效率的源头”，那怕一个平庸的计划也胜过于无计划的瞎摸索。第四，“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工夫”——号召“好人”们（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出来干政治，组织政府，与恶势力斗争。第五，“我们对于现在的政治问题的意见”。具体有六项：（1）南北问题必须解决，但不可用武力统一，只可召开南北和会议和，（2）议和、恢复1917年解散的国会等四条件；（3）裁兵；（4）裁官，实行“考试任官”制度；（5）选举制度的改革；（6）财政主张：彻底的会计公开，统筹预算，平衡收支。这一份有系统的政治纲领文件的核心宗旨是：好政府主义的基本观念是一种“政治的工具主义”，它的基本内涵有三点：一、人类是造工具的动物，政治组织也是人类造的或者说发明的最大工具。因为许多事业是个人或小团体小组织不能做到的，或大组织能做得更好的，故人类有利用这种大工具，组建这种大组织的需要。政府的存在，好政府的建设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二、这种工具是一种有组织、有公共目的的权力。法律制度都是这种权力的表现。权力若无共同的目标，必冲突，必至于互相抵消。政治与法律的权力因有组织，因有公共目标，故可指引各方面的能力向一个共同的趋向走去，既可避免冲突，又可增进效率。三、这种工具，若用得得当，可发生绝大的效果，可以促进社会全体的进步。人类社会的惰性极大，偏向保守。若靠自然的演进，必致没有进步，或进步极慢。政府的机关，若利用得当，乃是督促社会进步、打破社会惰性的唯一利器。政府就是现代人类必须也必然要建立的这个大工具，这个大工具性能质地弄得